



# 文學、詮釋與宗教—— 古典文獻學的跨界研究

趙飛鵬\*



## 一、前言

筆者自從 1982 年夏季，考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就讀，開始專注學習目錄學、版本學等學科，從事古典文獻學相關研究，迄今已三十多年了。一路走來，主要的研究範疇是以歷代藏書家生平及學術活動為中心，及其所延伸出來的有關古典文獻方面的各項問題。涉及的學科多元，諸如版本學、

\*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目錄學、校勘學、圖書史、藏書文化、文獻整理等，發表研究成果的數量雖不甚多，然而「力求創新、開發新課題」，要求每一篇論文都要有一些新意，則是筆者一直努力不懈的方向。1995年自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，1997年應聘到臺南的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。期間在系上擔任的課程，除了版本學、目錄學、國學導讀之外，還因為原來任課的資深教授臨時退休，一時聘不到繼任人選，而受命承乏，教了好幾年的訓詁學。以往的學科分類當中，訓詁學是屬於「小學」(即語言文字學)的，和古典文獻學似乎關係不大。然而在這幾年一面從事訓詁學的教學，一面繼續古典文獻學研究的過程裡，卻促使我在原有的教學與研究之外，開始思考訓詁學與古典文獻學的關係。

記得是1999年的某一個午後，成大中文系的同事張高評教授到我的研究室來聊天，他是研究宋詩的專家，就跟我聊到他研究宋詩的經過與心得，並鼓勵我可以將研究領域延伸到宋詩。言談之間對於版本學、目錄學也很感興趣，還開玩笑的說我姓趙，應該多多研究宋代。張教授的一番話，引起我對宋詩乃至宋代文化的注意，這是我接觸宋詩研究的開始。2000年，我就與張教授共同主持了一個國科會的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：「北宋文獻整理與宋詩特色之形成」(2000.8.1-2002.7.31)，兩年後，又執行了第二期的多年期計畫：「南宋文獻整理與宋詩特色之形成」(2002.8.1-2004.7.31)，也正式開啟了我在古典文獻學跨界研究方面的嘗試。<sup>1</sup>

2006年8月，筆者自成功大學回到母校臺灣大學中文系服務，不久就接受同仁鄭吉雄教授的邀約，參加了一項由教育部顧問室委託執行的研究計畫：「當代經典詮釋多元整合學程」，並負責執行其中一個子計畫：「中國佛教典籍與文化」。這個計畫由2007年9月開始，到2009年7月結束。兩年的執行期間，筆者除了在大學部開設了兩門新課程：「中國典籍與文化」與「中國佛教典籍概論」之外，同時邀請專家學者來校演講，總共辦了六場，另外也分別發表了三篇相關研究論文，成果尚可謂之豐碩。更重要的，對筆者個人而言，也打開了另一扇學術研究的門戶，也就是「由文獻學研究走向經典詮釋研究」。這個發展正符合了筆者多年來開發新課題的努力，而且對於前述古文獻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融攝關係，更有了較為清楚的概念。

<sup>1</sup> 張教授在這幾年中，也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，2008年彙集成《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—兼論圖書傳播與宋詩特色》一書，由里仁書局出版。



古典文獻學在以往的學術觀念裡，是屬於基礎性質的工具學科，一般大學中文系，很少開設有關於文獻學的專課，大多是在國學導讀、治學方法或讀書指導之類的課程中，介紹一點版本學、目錄學或校勘學的常識，既不是該課程的重點，學生也是聽聽就過去了，並不了解文獻學真正的價值所在。文獻學在文、史研究的圈子裡是相對冷門的。

任何一門學術，都有其發展傳統，也可以說是代表了這門學術的基礎訓練。從事學術研究，基礎訓練是必不可缺的。文獻學也是一樣，其傳統研究的範疇，離不開版本、目錄、校勘、辨偽、輯佚等。然而，文獻學的研究，如果僅僅停留在這些基礎範疇之內，必然無法擺脫工具學科的地位，也無法在當前的學術領域內取得發言權，就像是普通物理、普通化學、微積分一樣。因此，在延續學科研究傳統的同時，時代環境變遷的外部因素，與學術發展「新變求生」的內部要求，在在促使當代的文獻學研究者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：「文獻學這樣一門古老而又重要的學科，在現代的學術語境當中，應該如何煥發出新的生命光彩？」也就是說：除了版本、目錄、校勘、辨偽、輯佚之外，文獻學還可以研究什麼？面對時代的新局面，文獻學界的回應，大致有兩個方向：一個是在傳世文獻中，努力尋找新材料；另一個就是結合文獻學與其他學科的理念，開拓新題材。前者可以舉目前在文獻學界、文學界正蔚為風氣的「域外漢籍研究」為代表，後者則是筆者近十多年來從事文獻學研究時所關懷的主題。

「域外漢籍」是指「存在於中國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漢文（主要是古漢文）撰寫的各類典籍」。<sup>2</sup>由於中國文化很早就傳播於世界各地，古代漢籍也隨著文化傳播而存藏於各個國家。對於域外漢籍的蒐集典藏始於 19 世紀，而真正聚焦研究則是近 20 多年的事。南京大學文學院於 2002 年 2 月設立「域外漢籍研究所」，可說是此一風氣的代表，迄今該研究所已出版之相關研究成果有：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》、《域外漢籍資料叢書》、《域外漢籍研究叢書》等，而海峽兩岸有關域外漢籍的學術研討會亦不時舉辦，對於域外漢籍的研究風潮可說是還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。

至於「結合文獻學與其他學科的理念，開拓新題材」，是指借鏡於社會科學領域的「科際整合」概念，形成所謂的「跨界研究」(Interdisciplinary

<sup>2</sup> 參見張伯偉〈域外漢籍研究集刊·發刊辭〉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)，頁1-2。

study)。「跨界研究」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新的觀念，以往稱之為「科際整合」，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，如法律學、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教育學等<sup>3</sup>。近年來則逐漸進入人文學科的研究視域，開發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領域，如文學社會學、文學心理學、文本與圖像、物質文化研究等。近年來筆者關心的議題即是文獻學的「跨界研究」，在文獻學研究領域中尚屬探索性的研究方向。

## 二、研究成果簡述

近十年來，在文獻學的跨界研究中，筆者嘗試的有以下幾個方向：

### (一) 文獻學與文學研究

從西方的角度來看，「文學」(Interdisciplinary study)一詞，本來就包含了「文獻」的意義在內，文學研究也就是文獻研究<sup>4</sup>。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看法，《論語·先進》載有「孔門四科」：「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<sup>5</sup>其中「文學」一詞的意義，邢昺〈疏〉說是：「文章博學，則有子游、子夏二人。」意即泛指一切的學問。可知文學研究的基礎與文獻學是一樣的，都是以「文本」(text)為出發點。因此從文獻學跨界到文學研究，可說是最順理成章的。例如：從古代知名文學家的養成背景來看，我發現許多文學家其實也都身兼文獻學家，既有豐富的藏書，又有扎實的文獻研究、考證的基礎；表現於其文學創作，也有以理代情、情理兼備的特色。在這樣的理念指引之下，我寫了〈歐陽脩與宋代文獻學〉、〈陸游之藏書及其文學〉兩篇論文，補充了以往中國文學史寫作中未曾注意到的面向。又例如「類書」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文獻形式，一向也被認為與文學創作——尤其是詩歌——有密切關係。然而以往並沒有人做過具體的個案研究，我寫了〈詩人與類書——以黃庭堅之詩學為例〉，首次將宋代「江西詩派」代表人物黃庭堅的詩學理論與類書之間的關係，做了詳細討論。再如中國第一本專門記載藏書家史事的專書《藏書紀事詩》，以往只有文獻學研究者會注意到，研究文學的人似乎從沒注意過，即使

<sup>3</sup> 參見傅偉勳〈論科際整合的探索理念及其具體實現〉，收入《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》(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0年)，頁47-59。

<sup>4</sup> 陳文忠主編《文學理論》(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)，頁23-24。

<sup>5</sup> 《論語·先進》(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8年景印清·嘉慶二十年阮元刻本)，頁96。「四科」之說即見於邢〈疏〉。



研究清代詩歌的人，也從未見有任何著作提及此書。想必並沒有人從文學價值的角度去肯定它。然而這本書畢竟是以詩歌的形式完成的，其產生的因素也必然與文學有關。我在〈葉昌熾與清代宋詩風尚——論《藏書紀事詩》的文學意義〉一文裡，詳細說明了作者葉昌熾本來就是宋詩派的支持者，與當時宋詩派的健將多有往來。而「紀事詩」也是自〈戲為六絕句〉、《論詩絕句》等以來，早已有之的體裁，只是將主題擴展到藏書家故實而已，其在文學發展上的價值與意義，有必要重新檢視與表揚。

## (二) 文獻學與經典詮釋研究

文獻學除了文獻的形式問題之外，文獻內容的解讀，應該也包括在文獻學的範疇之中，這個部分可以特別稱為「經典詮釋」(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s)。「經典詮釋」的理念來自於西方學術界 20 世紀中葉以後頗為風行的「詮釋學」(Hermeneutics) 思想。詮釋學源自於中古時期宗教改革時，學者反對教會獨斷解釋《聖經》的立場，提出方法論的批判，主張應該由《聖經》的文字本身來理解《聖經》原義。經過 19、20 世紀眾多學人的努力，詮釋學已經超出神學範疇，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，並對哲學、文學、社會學、藝術學甚至法律學等學科產生深遠的影響<sup>6</sup>。詮釋學的目的，開始於一種對「文本」(text) 的理解態度，詮釋學是一種「掌握和理解文本所試圖說的東西」的學科。因為文本的每一次閱讀都發生在特定的個體、傳統或一個活生生的思潮中，從而所謂的理解和詮釋似乎總是與「詮釋者」的環境與個人條件息息相關而造成理解與詮釋的歧異。因此「詮釋學是一門關於理解、翻譯和解釋的學科，或者更正確地說，它是一門關於理解、翻譯和解釋的技藝」。所謂「技藝」是指詮釋時採用的方法與態度。針對前述的歧異，也有人說：「詮釋學是一門消除誤會的學問。」無論對於詮釋學的定義如何調整，必須承認：詮釋學的研究對象與文學一樣，離不開「文本」，而「文本」本身也就是文獻。例如傳統文獻學的基礎之一：目錄學，其研究對象是歷代公、私所編撰的藏書目錄，而目錄的編撰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編撰者的學術觀念，也可以說：編撰目錄就是一種學術史的工作。清代章學誠的名言：「辨彰學術，考鏡源

<sup>6</sup> 關於詮釋學的內容及發展概況，參考下列書籍：帕瑪 Richard E. Palmer 著，嚴平譯《詮釋學》(臺北：桂冠圖書公司，1997 年)；嚴平編選，鄧安慶等譯《伽達默爾集》(上海遠東出版社，1997 年)；洪漢鼎主編《理解與解釋——詮釋學經典文選》(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01 年)；潘德榮《詮釋學導論》(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1999 年)。

流」，正是表明目錄學與學術史的密切關係。因此，通過目錄學進行經典詮釋活動，是可行的。我在〈全祖望「以目錄詮釋《易》學」考論——目錄學與經典詮釋〉一文中，即以清初經史學家全祖望之著作為例，探討其以目錄著作闡釋《易經》的成就。再如校勘學，其目的雖然在「恢復古書的本來面目」（胡適語），也就是盡可能找出古書中字句的錯誤加以訂正。但是在校勘過程中，許多問題其實與字詞意義的解釋有關，換句話說，校勘與解釋是一體兩面的，古人著書，時常以「○○校釋」作為書名，亦正是此意。我在《〈讀書雜誌〉運用類書校釋先秦諸子古籍述評——校勘與經典詮釋》與〈清儒「因聲求義」校釋古籍方法述論——訓詁與經典詮釋〉兩篇論文中，分別從校勘與訓詁（亦即解釋）兩方面，闡述文獻學與經典詮釋的關係。「因聲求義」一文，也即是前面講到我在長期思考訓詁學與文獻學的關係時，得到的研究成果。

### （三）文獻學與宗教研究

中國古代的宗教，以佛教、道教為代表，而佛教的影響，更是深遠。自西元一世紀傳入中國以後，佛教對中國人的思想、文化、文學、藝術等各方面都產生廣泛的影響，以致逐漸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。自南北朝以後，第一流的思想家、文學家幾沒有不受到佛教影響的（即使反對佛教也是一種影響）。個人除了文獻學的專業之外，另一個研究的範疇就是佛教思想。前面談到我曾開設「中國典籍與文化」與「中國佛教典籍概論」兩門新課，在教課的同時，我注意到在文獻學的研究過程裡，存藏著大量佛教的資源，值得深入發掘。於是我寫了〈試論五代佛教與藏書文化之交涉——兼論江正與李後主之傳說〉、〈禪宗典籍的整理與宋詩宗風——以《碧巖錄》為中心之考察〉、〈元代雙色印本《金剛經》相關問題考述〉三篇論文，分別從藏書史的典故、禪宗典籍的注解流傳以及海內孤本的雙色印刷佛經的不同角度，探討文獻學與佛教的互動關係。我認為這個主題不但首開文獻學研究的風氣，而且還可以拓展到文獻學與道教的關係研究，前景未可限量。

到目前為止，筆者撰寫的有關文獻學跨界研究的學術論文，已超過 15 篇，集結出版了兩本專書：《圖書文獻學考論》（里仁書局，2005 年）、《文獻學的傳承與探新》（臺灣學生書局，2014 年修訂版）。

## 三、結語

介紹了個人近年來的研究狀況之後，想談一些題外話。前文曾言及在臺



灣的學術界，文獻學一向是冷門學科，相對的，與臺灣的門庭冷落情況不同，中國大陸的古典文獻學研究，一直是受到國家級關注的重點學科之一<sup>7</sup>。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種差距：一個是大陸各重點大學，幾乎都設有文獻學研究或古籍整理的相關系所，目前共有 26 家；而臺灣唯一的一所文獻學專業研究所——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，在撐了 12 年之後（91 學年開始招生），將於 104 學年併入臺北大學中文系。二是大陸出版的有關文獻學研究的專著、教科書，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，至少超過 250 部，而臺灣學者撰寫出版的，則大約不到 100 部。如此的差異現象，最明顯的影響就是：凡是國際性的古籍文獻研討會，臺灣學者能夠受邀參與的寥寥可數，甚至完全缺席。照這樣下去，在古文獻研究的場域中，臺灣的能見度只會越來越低，以致完全被忽視。大陸文獻學者要來臺參觀訪問，也常有找不到對口單位或適當人士來接待的窘境。其中原因，自然與前述臺灣學術界長期以來，以工具學科視文獻學而不加重視有關。筆者多年來一直努力從事文獻學的跨學科研究，就是私心盼望著擴大文獻學的學術義涵，有一天能改變學界同仁對文獻學的觀感，同時引起教育部的重視，使得國內文獻學這種寂寥的情況能夠改善，並且開拓另一條途徑，讓臺灣走向國際。可喜的是，臺大中文系一直保持著文獻學研究的傳統，多年來不少師長、朋友也對筆者的研究方向表達關心與支持，謹藉著本文發表的機會，表示衷心的感謝！

<sup>7</sup> 中國國務院特別在教育部設置了「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」負責統籌、規劃及指導全國高校（大學院校）的古籍文獻整理、研究、人才培育等事宜，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。